编辑故事

三月的江南，花团锦簇，春意盎然。率先开放的是梅花，不久怒放的将是玉兰、茶花、桃花、海棠、樱花、牡丹、芍药、杜鹃……春花总体是艳而绚烂的，但艳而绚烂的花大都花期不长，因而人们总是不断地叹春、惜春甚至恨春。人们往往希望美好的东西持续而长久，可总不如愿。

江苏出版界德高望重的前辈蒋迪安先生于春光灿烂之时离开了我们。蒋迪安先生是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江苏出版界乃至中国出版界重量级文化大家，长期担任江苏省新闻出版局局长、江苏省出版总社社长，是江苏省第一个韬奋出版奖获得者，是我的老领导和恩师（如果他不嫌弃我这个远远不合格的学生的话）。在他去世的第二天，正逢凤凰传媒年度工作会议的召开，我想上天有意成全我们，让我们凤凰出版人在难得一次的全体聚会中共同来怀念他。我和当天在座的同仁，要么是蒋局长亲自或同意招募到出版系统来的，要么是他的传承人直接培养起来的——我们大部分人都是老蒋局长的“徒子徒孙”，他影响了直至现在的凤凰出版人。我本来想在《文艺报》本期版面中约一组文章来怀念和致敬，但担心内容过于凝重，还是决定只推荐一篇我约来的江苏凤凰电子音像出版社原社长谢小朋的怀念文章，而我自己的长篇追思文章发到了江苏省内的媒体上。

本期我还邀约了人民出版社原社长黄书元先生。黄社长是我的老领导，说他是老领导，因为全国人民出版社都秉持“全国人民出版社是一家”的核心理念。各地人民出版社都曾是国家人民出版社的地方分社，在70余年的出版历史中，各地人民出版社在“国字号”人民出版社的指导和帮助下茁壮成长，合作的项目对中央和地方出版事业产生持续而重要的影响，是“两个效益”双丰收的典范。2012年春天，我开始担任江苏人民出版社社长，上任的第一站便前往位于北京隆福寺街的人民出版社，拜访黄书元社长和任超常务副社长，受到他们的热情接待和亲自辅导，这大大提升了我担任地方人民出版社社长的信心。在后来近10年的岁月里，人民出版社对江苏人民社和其他地方人民社给予了极大的帮助，在我心中进一步强化了“全国人民出版社是一家”的深厚感情。

黄社长长期在安徽地方出版单位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我本来向他约稿的方向是请他撰写从安徽地方出版局（社）到中央大社职务和工作转型的体会，以便为今后类似从业者提供难得的经验。黄社长非常谦虚，未明示同意，更未答应何时交稿，但他近期突然发来稿件。这篇文章全方位地回忆了他组织、策划的《中华三德歌》当年发行700万册的全过程，从策划到组稿，从组稿到完稿，从完稿到发行，从发行到宣传，从宣传到“两个效益”的收获的全部细节。这对于今日做透主题出版乃至其他出版物，极具启发意义和参考价值。尽管时移事易，媒体和读者、时代和主题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但道在其中，术也在其中。

——主持人 徐 海

700万册发行量的主题读物：从策划到文化回响

□黄书元

在我四十余年的出版生涯中，《中华三德歌》的出版无疑是最值得铭记的一次经历。1997年，我还在安徽教育出版社任职，亲历并深度参与了这本书从策划、创作到出版、发行的全过程。该书累计发行量高达700多万册，荣获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全国优秀畅销书奖”以及安徽省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等诸多奖项，成为当年出版发行领域中最具影响力的图书之一。回顾其编创历程，许多细节至今历历在目，值得细细品味与深入探究。

黄书元

时代需求应该是出版工作者永恒的关注点。其次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文化的传播在于要触动人心、引发读者共鸣

缘起：时代浪潮

中华民族自古以来便对道德建设极为重视，从《道德经》到《朱子家训》《颜氏家训》等经典著作，“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种树者必培其根，种德者必养其心”，这些历经岁月洗礼的理念，早已深深融入中华民族的血脉之中，成为全人类共同珍视的精神财富。

改革开放使我国经济腾飞发展，但也受到了一些不良文化因素的冲击。1996年10月，中央发布了《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决议》），强调了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提出了加强道德建设的具体要求和目标，随后成立了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主抓这项工作。时任安徽社科院文学所所长的钱念孙先生，是一位睿智而又深有影响力的学者，有多部学术著作获得国家级大奖，他的《中国文学史演义》产生了巨大影响，多年以来是学生的必读书。他很敏锐地捕捉到这一信息，认为可以在这方面做一些开创性的工作。

策划：创新思维

钱念孙先生找到我，谈起《决议》出台的背景、目标和意义，希望我们能够共同策划出版一本书，以响应号召、回应时代。我被他的热情和责任感所感染。思索良久，觉得在道德建设领域，一般性的理论探索、阐释类书籍早已琳琅满目，若想在这片领域有所建树，必须在形式上大胆创新，走出一条与众不同的道路。于是，我谈了我的一点想法：我们如出版这本书，那就要严格遵循中央《决议》的要求，确保方向正确，又要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的美德，做到传承与创新并重。在内容和形式上，要充分考虑让读者喜闻乐见、易于接受。鉴于我们是教育出版社，所以这本书最好能够精准满足青少年的成长需求。

钱念孙先生对我的想法深表赞同，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创新性和前瞻性的构想。他希望这本书能够巧妙地融合传统与现代、理论与实践、通俗与高雅、阅读与咏诵等多种元素，具体说就是以诗歌形式创作，集思想性、知识性、艺术性于一体，通过图文并茂的方式，让作品易记易诵、便于传播，这一构想成为后面创作的标杆，也为我们开启了通往成功的大门，我们一拍即合。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在内容创作上，我们决定采用四字一句的方式，高度凝练地表现《决议》中关于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这三方面的精髓。这无疑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艰巨任务。钱念孙先生凭借其深厚的文学功底和对道德建设的深刻理解，率先完成初稿。然而，他并未满足于此，而是以更加开放的心态和追求卓越的精神，主动提出扩大作者范围，发挥集体的力量。于是我们邀请到了刘祖慈和周志友两位深具影响力的诗人，以及以严谨细致著称的安徽科技出版社原总编辑任弘毅、安徽省委宣传部宣教处原处长汪东恒等人加入。至此，汇聚了文学、艺术、编辑等多领域的精英，他们性格各异，学识互补，一个充满活力与创造力的创作团队正式组建。

创作：千锤百炼

创作过程中，作者们时而欢声笑语、共同探讨，时而面对难题、紧张严肃。从清晨到夜晚，讨论声、欢笑声交织在一起，但在对每一个字词、每一句诗的斟酌上，他们却展现出了超乎寻常的严谨态度。为了一个字的精准表达、为了一句诗的完美呈现，他们常常争论得面红耳赤、互不相让。每个人都坚持自己的观点，据理力争，却又在争论中碰撞出智慧的火花。有时看似已经完美无缺的句子，经过深入分析和反复推敲后，又会被无情地推翻重来。在这个过程中，他们不断修改，历经二十多稿，每一次修改都是一次自我超越。最终的作品与初稿相比早已面目全非。

为了使作品更加完善，我们在《安徽日报》上全文刊登了作品初稿，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很快，便收到了370多封热心读者的来信。每一封来信、每一条意见都被创作团队认真研究讨论并合理吸收。我们还在安徽师范大学、安徽大学、安徽社科院等处分别召开座谈会，邀请专家学者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例如，时任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的朱良志教授在收到初稿后花费了几个通宵对诗稿进行了精心修改，经过他的修改，全文贯通一气、一韵到底，为作品增添了不少光彩。安徽师范大学教授孙文光先生建议把书名改为《中华三德歌》，也得到了大家的一致认可。

书中五十多幅彩色插图由安徽师范大学艺术系教授李向伟、吴同彦、陈涛等几位画家精心绘制，他们绘制每一幅插图都先勾出多幅草图，然后精挑细选，从图案设计到色彩搭配、从内容到风格，力求做到与文字相得益彰。审图时，哪怕是细微的瑕疵也不放过。如一幅青年在长城上喝饮料的画面，原本是可口可乐，经过反复讨论后将其改为健力宝。还有一个体操运动员配图，国旗悬挂的位置不对等问题都被一一纠正。大家以严谨的态度对待每一个细节，确保每一幅插图都准确无误。

封面设计者包云鸠提出以小女孩吹蒲公英的意象，寓意为“中华三德”像蒲公英一样轻盈地飞向全国，将道德的种子播撒到每一个人的心中。为了找到最合适的形象，汪东恒亲自前往幼儿园仔细挑选，最终找到了那个眼神清澈、笑容纯真的小女孩。记得在即将开机印刷的晚上，我们去印刷厂对付印样片做最后检查，突然有人提出：最好在卷首有几句话，让封面与正文内容连接起来，让其寓意更易被读者理解，大家当即围坐在印刷车间的一张小桌旁，现场创作，快到夜里十二点绞尽脑汁也没拿出所有人都满意的文稿来。还是第二天早晨从任弘毅先生带来的《植物学大词典》中获取了灵感，将蒲公英的词条改造成一段优美的散文诗，虽然只有短短几句，却为整本书画上了点睛之笔。由此可见创作之不易。

宣传：全方位传播

《中华三德歌》的宣传推广堪称一场精心策划的战役。

当时，中央的《决议》颁布不久，社会对道德建设相关书籍有着强烈的需求，人们渴望通过阅读优秀的作品来提升自身的道德素养，《中华三德歌》的问世恰逢其时。

书稿创作后期，我们在《安徽日报》全文刊登征求读者意见、召开专家座谈会等，引发了市场对这本书的期待。书一问世，我们又迅速召开新书发布会，再次在各种媒体上刊登新闻和书讯，推动社会舆论关注这本书的动态。中央电视台的《焦点访谈》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文化现象，专门赴安徽进行了深入的专题报道。国内众多权威媒体纷纷跟进报道，一步步推动了书籍热度的提升。后来，还有18个省市的中小学《思想品德》课本纷纷转载或引用其中的内容，在一段时间里，《中华三德歌》成为了舆论场中的焦点话题。

前期的精心策划，社会各界的积极参与，创作者、编辑团队和专家学者的智慧，以及安徽教育出版社拥有的读者群体和完善的发行渠道，这些力量汇聚成一股强大的合力，为此书的广泛传播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这本书刚摆上书店的货架，市场便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我记得《焦点访谈》的报道一结束，我家的电话一直响到深夜，全国各地的求购信息纷至沓来，有一位沈阳的个体书商，第二天就提着一大皮箱现金飞到合肥，要求立即发货，另有一位美国华侨很快给我们寄来了5000美元，要求购书送给他家乡的学子……全省多家重点印刷厂全力以赴开机印刷，但因彩色印刷力不足，一度出现洛阳纸贵的现象，这也成为当时媒体传播的重点。

启示：传承与使命

二十多年后再回首，《中华三德歌》的出版历程启示我们：

时代需求应该是出版工作者永恒的关注点。把握住时代需求，加上勇于创新，善于整合各方资源，精益求精，才有可能策划并打造出优秀的产品。

其次是“内容与形式的统一”。用通俗易懂、大众喜爱的形式诠释精深的理论内容，让读者接受，应该还是可行有效的。

其三、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时代，文化的传播不再是单向的灌输，不仅需要与时代精神相结合，以更加生动、易懂的方式呈现给大众，更要触动人心、引发读者共鸣。

在未来，我们应继续用心浇灌每一颗文化种子，让它们在时代的土壤中茁壮成长，为社会、为精神文明建设贡献更多力量。

（作者系人民出版社原社长）

出版家蒋迪安

□谢小朋

晚上接到曾经的老同事、江苏凤凰出版集团总编辑徐海先生的约稿，要我为去世的江苏省新闻出版局原局长蒋迪安先生写篇文章。许多往事和情感浮现在眼前，一时无从下笔。

与蒋局长最后一次见面还是10多年前。那时我也已退休，刚上了公交车，一眼看到年近80的蒋局长也在车上，要去医院看望一位老同事。他消瘦的身躯略显佝偻，目光却依然深邃。聊了几句后，我便目送他下车。

1991年我从部队转业，分配到江苏省新闻出版局。一个25年的坦克兵成了出版从业者，不禁有些大象进了瓷器店般的忐忑。一次，我随蒋局长去看望刚退休不久的原国家新闻出版署署长宋木文。宋老关心地问我是哪个大学毕业的，尴尬中，蒋局长代答说是部队转业到机关党委当副书记，宋老笑着说我是从“大学校”出来的，并连声说好。在返回的车上，蒋局长宽慰我说，在江苏省出版系统中，从部队来的人不少，都取得了很好的成绩。任何人只要努力，外行变内行并不难。

1992年，我调任江苏省印刷科学技术研究所当所长，当时正值印刷企业设备升级换代。在配合各印刷厂用激光照排取代铅字排版、用胶印机更新铅印机的过程中，我又想起了上任前蒋局长对我的交代，研究所不能仅盯着印刷技术，还要推动出版环节发展。于是，我凭借在机械化部队服役时学到的激光红外和通讯知识，以及到研究所接触的电脑知识，斗胆向他建言：信息技术革命迟早会波及出版业，建议在全系统推广计算机，不仅要在印刷环节中“告别铅与火”，还要争取在出版环节上“告别纸与笔”。我的“大胆妄为”和一知半解，得到了蒋局长的肯定。

开始推广计算机时阻力不小。当时的386台式计算机售价不菲，有些单位哭穷买不起，有些单位像宝贝一样“供”起来，建了专门的电脑室锁住，不让小青年们碰。蒋局长率先给局机关各处室配置了计算机，并发通知要求从各社总编办开始，各种统计报表必须附加电脑文档上报。业态转型的真正拦路虎是人才转型，于是局里从当年军转干部中录用了一位计算机专家，并连续办了7期电脑培训班，拨专款建了培训教室，研究所的年轻人成了兼职教员。

人手一台电脑只能解决打字，下一步是办公自动化。那时还没有互联网，研究所在机关和各单位铺设同轴电缆，建起了局域网。软件使用突破口则从开发“扫黄打非”系统开始，时任省“扫黄打非”办公室主任的陆幸生亲力亲为，把计算机和软件培训班办到了13个市级文化（新闻出版）局，通过调制解调器+电话线实现远程信息共享。

试运行那天，蒋局长亲自坐镇。这套系统升级引起了当时的新闻出版署的注意，有领导专门来到南京仔细观看操作流程，建议向其他省市推广。这套系统还被评上了“科技进步奖”。

1995年冬，在扬州召开的江苏省出版系统年度工作会议期间，蒋局长又给了我新任务，让我去当时江苏省出版总社的电子音像出版部接任主任一职。

出版行业编（辑）印（刷）发（行）供（物资供应）各环节中，出版是上游产业，也是妥妥的知识密集型产业，当主任（相当于社长）单有执行力还不够，更多需要的是创新。蒋局长看着我一脸为难的表情，聊起了他当年从省委宣传部调到江苏人民出版社、从普通编辑干起的往事，说只要愿学，出版说难也不难。谈话结束时他告诉我，他对我的工作安排曾有两种考虑，另外的安排是到江苏省印刷厂当厂长，但他认为我还是做出版更合适，因为出版需要开拓、冒险。

为解决电子音像出版社的后顾之忧，总社当时除投入大量资金外，还有很多人员工资暂留总社，蒋局长在大会上解释说，这也是为了发展新的生产力。

那几年总社每年召开两次社长总编辑会议，讨论年度选题和出版进程，各位社长既是各门类的领军人才，也不是“善茬”。大伙儿畅所欲言，集思广益，也有观点不同或利益冲突，倔劲上头，难免争得脸红脖子粗，蒋局长总是微笑倾听，偶尔插话，末了经他富有哲理的调解和总结，大家总能心情舒畅，愉快接受。

2003年，法国计划在中小学推广汉语教学，我专程赴法与当地出版社讨论推出电子出版物《一游记》。这部作品从前期制作到后期压盘全部在中国完成，用中国神话传说形式，以游戏为载体，供当地1500所学校学习汉语。中法双方于2006年联合组团参加了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的多媒体大奖赛，《一游记》获得大奖，像这样的奖项我社已获得过百余种。我始终认为，出版社有今天，离不开蒋局长当年的支持，更进一步来说，整个江苏出版产业也都受益于他。

我印象最深的是，他在一次会议上要求各出版社不能只顾出书，还要开发衍生产品，比如与电子音像出版社合作出版配套磁带光盘，并调侃说：“别以为我不知道你们所谓的‘合作’，说白了就是我的手伸到你的口袋里，你的手伸到我的口袋里，都不愿意吃亏。电子音像出版社现在还很弱小，口袋里也没有钱，在座诸公要手下留情！别看现在书卖得好，人无远虑必有近忧，要看远一点，图书配上多媒体，走立体出版的道路。”这可是30多年前的事，那时还没有融媒体这个概念。从现在新媒体的迅猛发展、传统纸媒的空间在不断压缩中求突破的情形看，蒋局长当年的眼光真的不一般。

老蒋也有很多业余爱好，但大家都说不准，因为他自称唯一的休闲是看金庸小说。但他也很关注医卫出版，据说因为自己胃不好。他也偶尔晒晒收藏的古书善本，这或许和江苏的古籍出版在全国名列前茅有关。我还看到过他在音像小店选购唱片。当政府要求出版系统介入光盘行业时，他积极拥护，认为这是一个做大做强的切入点。除此之外，他还认为要涉猎影视行业，让内容出版产生多种效应。

1998年，我被派往某光盘厂，蹲点摸底两个月，修复旧机。刚退休的蒋局长，一度希望尽快与原资产方达成合作协议，尽快形成生产力。但经过数轮谈判，对方索价远超有关部门预期，我如实汇报，建议放弃，异地另起炉灶，确保我方控股权和生产安全。蒋局长虽感到失望，但还是同意了我的意见。江苏省新闻出版局在无锡成立了江苏新广联光盘有限公司，企业不到十年就发展成全国最大的光盘企业，并最终被确定为国家重点扶植企业，奠定了江苏省光盘企业高速发展的基础。他进军影视行业的夙愿，也在凤凰出版集团的努力下得以实现。2012年，凤凰出版集团与中央电视台合作拍摄大型纪录片《长城：中国的故事》，我被返聘赴京参与具体操作，2015年该片在央视播出，版权输出多个国家……

数十载春秋，很多人很多事都逐渐被淡忘，但我一直记得这位热爱出版事业并为之倾心奋斗，对我亦影响深远的老人。许多人都会讲起和他交往的点滴细节，而我只是其中的一个罢了。

（作者系江苏凤凰电子音像出版社原社长）